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制度化养老、家庭功能 与代际反哺危机

以上海市为例

刘燕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制度化养老、家庭功能 与代际反哺危机

以上海市为例

刘燕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化养老、家庭功能与代际反哺危机:以上海市
为例/刘燕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748-6

I. ①制… II. ①刘… III. ①养老-社区服务-研究-
中国 IV. ①D66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0531 号

责任编辑 龚 权

制度化养老、家庭功能与代际反哺危机

——以上海市为例

刘 燕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25 插页 4 字数 209,000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748-6/D·2855

定价 48.00 元

序 言

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我的研究兴趣也从城镇化拓展到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其中城市和农村的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成为我近几年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依托国家小城镇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我们形成了一支以年轻副教授和博士生为主的稳定的研究团队。刘燕博士便是这个研究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几年来,我们承担了多项国家和地方政府、社区和企业委托的相关研究课题,对中国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养老社会保障问题开展了全面而深入的实地调研工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研究资料。从养老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对不同的养老模式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段群体养老需求的差异,预测养老需求的发展和变化趋势。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新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逐步构建和发展起来。通过剖析多主体的养老供给体系,努力探索构建适用于中国目前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升整个社会的福祉,是我们研究团队追求的终极目标。

《制度化养老、家庭功能与代际反哺危机》一书是刘燕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该书研究初期,刘燕博士参与了我们课题组多个相关养老课题的调研工作,在社区、家庭、养老机构、相关政府主管机构进行了多轮问卷调查、个案深度访谈、小组访谈,掌握了大量的一

手资料。在对现实问题有了比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在多位专家指导下,非常慎重地确定了选题、设计了研究的框架。在研究过程中,刘燕博士通过对一定时间跨度内(主要涉及2012—2013年)电视访谈的养老节目的相关信息进行“全还原式”的整理,形成了数十万字的原始资料。然后对这些信息资料进行详细的、逐段的、多阶段的编码和提炼,才形成该书颇有新意的研究观点和理论发现。

该书对于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探索代际反哺危机的形成机理,整合制度化养老和家庭养老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该书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在一个家庭中,养老模式的选择是基于一种怎样的逻辑”。从子辈的赡养逻辑看,已经从赡养义务转向赡养责任,并且将赡养责任与父辈对财产的分配份额联系起来,市场意识已经嵌入家庭责任。父辈则依据自己对财产权利的掌控,依据有限理性的决策逻辑,秉持折衷和妥协原则柔性地选择不同的养老模式。第二,“制度化养老与家庭养老之间是什么关系”。该书研究发现,制度化养老对家庭养老产生了“挤出效应”,并且创造性地论证了这是一种“交叉性挤出效应”,即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支持层面,同时在向精神支持层面和生活支持方面蔓延,出现了“代际反哺危机”。第三,“政府和家庭在养老责任方面如何定位”。政府在经济社会文化管理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制造了“制度性风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应该是化解养老风险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同时家庭的养老功能同样不能轻视,如何有机结合两者的功能呢?作者提出政府责任的着力点放在助力家庭的养老功能,制定“帮家庭从而帮老人”的人性化养老政策。

综上所述,该书体现了以下鲜明的研究特色。

第一,以规范的质性研究方法,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论证制度化养老的建构逻辑,同时从经济和文化视角阐释家产获得模式的变迁和孝文化的式微对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由此构建“代际反哺危机形成机

理”的理论模型。

第二,在反思制度化养老存在的风险基础上,论证制度化养老对家庭养老功能的挤出效应,明确定位养老责任的最终主体在于家庭,政府的责任在于帮助和支持家庭获得资源并增强养老功能。

第三,以风险社会研究视角,提出适应多元化养老需求的养老风险分担机制。开创性地构建“制度化养老”和“家庭养老”融合的社会政策原则与理论框架。

基于以上的系统讨论,从理论上构建“代际反哺危机形成机理模型”。阐述了代际反哺行为同时受到经济和文化两类因素的影响,其中家庭关系和赡养理性是代际反哺的经济基础因素,家庭伦理和信任关系是代际反哺的文化基础因素。这两大因素交互影响,决定一个家庭的赡养逻辑和赡养行为。不难看出,全书始终呼唤家庭功能的回归,强烈呼吁重构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家庭伦理道德体系,唾弃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市场理性逻辑在家庭关系中的蔓延,否则“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天伦之乐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通过一系列纵向与横向的经济、社会制度梳理,同样强调了政府的养老责任和定位。

刘燕博士勤奋刻苦,具有坚实的学术功底,具有良好的理论探索 and 创新能力,已在相关研究领域发表多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获得了答辩会导师们的高度评价。2013年她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资助,将研究领域从城市的养老问题向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延伸,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和科学,并尝试探索社会学、管理学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融合和创新。刘燕博士下月即将赴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项目,开展养老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相信她的研究能力将进一步提升,研究视野将更加开阔,期待着她取得更大的成绩!

纪晓岚

2015年12月30日

于上海

致 谢

临近 40 岁才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确实需要挑战一个人的勇气和毅力。应该承认，这个过程相当艰苦和孤独。家人和朋友秉承一种既支持又反对的矛盾心理陪伴着我，但我就是如此执着和坚持。当然，五年的读博生涯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确实有点漫长而拖沓。但是，我无愧于我的工作职责，无愧于照料家庭，当然代价一定是牺牲我的个人生活和享受。同时，我需要经历跨专业的思维模式转换及对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熟悉过程，如此看来，这个时间积累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此期间，我很荣幸地得到了众多学者和亲朋好友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得以完成博士论文的研究。

首先，我的导师纪晓岚教授是带我走进社会学领域的领路人和教导者。开题之初，纪老师始终操心着我的论文选题，亲自带我去北京拜见郑秉文教授和杨燕绥教授，向他们请教和讨论选题的方向和研究价值。从开题到论文框架，围绕着养老的话题，已经几易其稿，都是纪老师不厌其烦地给我指导和修改建议。每次深夜给纪老师的邮件，总是能够得到她的即时回复和指点，她勤奋执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始终激励着我，深切感动之余不敢有任何懈怠之心。进入社会学领域之前，我不擅于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但是每次跟随纪老师在各地调研，也开始慢慢学习她那么用心细致观察社会现象的细节，努力思考社会要素之间

的关系。我的研究过程第一阶段的大部分原始资料都是在纪老师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共同收集完成的。纪老师给予我的充分理解、宽容和教导是我完成此书最大的动力。

同时,在我读博期间,幸运地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他们是:曹锦清教授、徐永祥教授、张广利教授、张昱教授、范斌教授、李瑜青教授、费梅苹教授、杨发祥教授、罗建平教授、张良副教授、汪华副教授、赵方杜副教授、赵环副教授、龚秀全副教授、王余博士以及公共管理系的所有同事,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建议和丰富的精神力量。我只有以加倍努力的工作和学习来回报所有教导、帮助和支持我的导师和朋友们。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家庭是我得以休憩的港湾。这么多年来,我尽量坚持在周六(日)与母亲促膝交谈,家长里短,这使我与优雅美丽的母亲度过每一个身心愉悦的“母亲日”。而对父亲大人的思念则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身遗憾,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永远年轻的52岁男神!工作、学习的压力常常令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而,面对我的所有任性,却是我的先生全单收下,他的无原则无条件地包容和鼓励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尽管我需要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但是他给予我的精神愉悦是我的希望所在。

在此,感谢支持我的所有亲朋好友,这也是我创作本书的思想源泉之一,那就是对社会和个人来说,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始终坚持呼吁“先帮家庭从而帮老人”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永远根植于我们的基因里!

感谢艰辛的环境磨砺我的意志,让我可以悦纳工作生活中任何一种经历!

目 录

序言	1
致谢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9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3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研究框架	36
第一节 文献综述	36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	51
第三节 研究框架及内容	58
本章小结	62
第三章 制度化养老建构逻辑与结构体系	65
第一节 家庭结构变迁与家庭养老功能之间的张力	65
第二节 国家职能的调整与制度化养老的生成逻辑	76
第三节 制度化养老的结构及其在家庭层面的介入	81
本章小结	91

第四章 制度化养老对家庭养老功能的挤出效应	94
第一节 民生建设语境下制度化养老功能的扩展	95
第二节 替代性预期与养老行为的选择策略	106
第三节 子女赡养责任的抽离与家庭养老功能的挤出效应	112
本章小结	118
 第五章 代际反哺危机:家产获得模式的变迁与赡养理性的转变	 120
第一节 家产传承中的依附与共生:代际反哺的经济基础	121
第二节 家庭共同体的功能削减与代际反哺弱化	129
第三节 选择性养老:赡养理性的转变与对权变的期待	135
本章小结	149
 第六章 孝文化的式微与城市社会代际反哺伦理的消解	151
第一节 建国以来基于现代性诉求的政治动员及其对传统 孝文化的批判	152
第二节 子女自主性成长与赡养责任淡化的合法化	157
第三节 代际之间付出与报偿均衡逻辑及其弱化	165
第四节 陌生人社会:家庭信任危机与公众舆论的日渐沉默	173
本章小结	183
 第七章 规避养老风险的制度与养老制度化风险	186
第一节 养老风险的制度化规避	187
第二节 制度化养老的意外后果	189
第三节 基于风险分配的理性思考	205
本章小结	215

第八章 走出养老困境:制度化养老支持下家庭养老社会政策

 思考..... 217

 第一节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现代意义诠释..... 217

 第二节 家庭养老政策的目标定位..... 221

 第三节 家庭养老政策框架构思..... 226

 本章小结..... 233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236

 第一节 研究结论..... 236

 第二节 研究的创新点..... 247

 第三节 研究不足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248

参考文献..... 251

附录 本书收集的案例清单..... 25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1. 社会转型之痛

所谓社会转型,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是指中国“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具体说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封闭的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现代社会的转型。^[1]中国社会转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社会优化,另一方面也存在相当多的社会弊端和社会矛盾,中国社会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转型成本。

社会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显著的。经济领域释放出的巨大生产效率和活力,公众个人自由选择工作、生活方式的权利基本得到保障,城乡面貌、社会建设能力得到大力改善。然而,在利益格局、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大量不协调的关系,造成社会发展出现失衡现象。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

会结构和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带来了人们居住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变革。社会的细胞——家庭也充分见证了这种变革的发生。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力实施改变了原有的家庭结构。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4-2-1”家庭结构日渐普遍。在一个大家庭中(这里仅指亲属关系,而非居住关系),掌握经济资源的角色主体可能从老人向中青年转化,两代人之间的经济依赖性逐渐减弱,直接导致老年人在家庭中的重要程度降低,子辈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两代人经济的独立性增强必然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老年人和子辈分开居住,家庭规模缩小,向核心家庭方向发展,独居老人比例增加。研究表明,第一代独生子女与父母居住关系是,青年人婚后单独居住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主流形式。其中,双独家庭与老年父母分开居住的比例更高达 73.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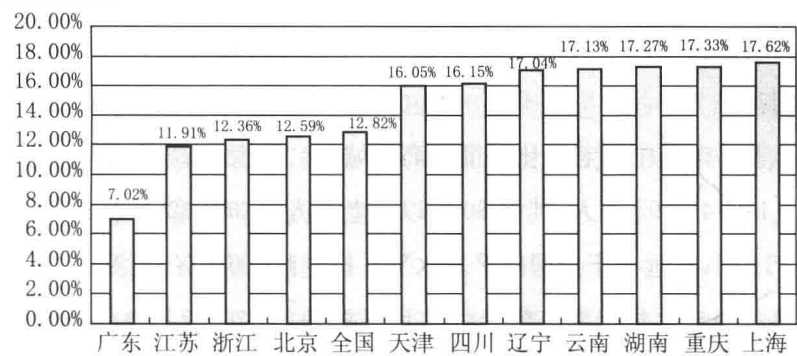
2. 老龄化发展趋势

据《2010 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776 5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 13.26%。据估计,到 2030 年,我国老年人的比例将会翻一倍,达到 27%。截至 2012 年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1.9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4.3%。

按照各地区城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的情况来看,截至 2009 年底统计数据(部分省份和直辖市),就老年抚养比^[3]数据来看,全国老年抚养比为 12.82%,北京为 12.59%,天津为 16.05%,相对而言,上海最高为 17.62%,广东最低为 7.02%。部分省市老年人抚养比比较情况见图 1.1 所示。

研究表明,由于受到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参与率因素的影响,理论老年抚养比与实际老年抚养比存在偏差。^[4]其中,广东、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均存在负偏离,即实际老年抚养比高于理论老年抚养比,说明这些省市实际的养老负担重于理论负担。

老年抚养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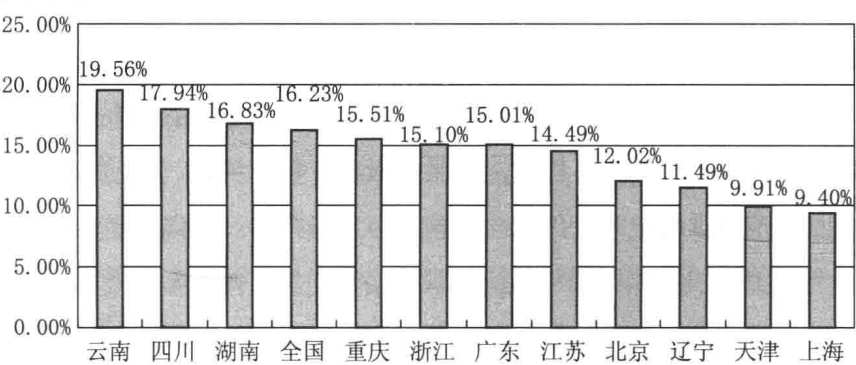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010》电子数据库。

图 1.1 部分省市老年抚养比

同时就少儿抚养比^[5]来看,全国少儿抚养比为 16.23%,北京为 12.02%,天津为 9.91%,广东为 15.01%,相对而言,上海少儿抚养比最低,为 9.40%。部分省市少儿抚养比比较情况见图 1.2 所示。

少儿抚养比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010》电子数据库。

图 1.2 部分省份少儿抚养比

与全国其他特大城市和省份相比,上海的特点是老年抚养比最高,而上海的少儿抚养比最低,说明上海劳动人口的养老负担最重,上海城

市的人口结构向深度老龄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日趋严峻。这也是本书选择上海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同时也将讨论部分天津和广东的案例。

上海市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截至 2012 年底,上海户籍总人口 1 426.93 万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367.32 万人,占总人口的 25.7%,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据老龄研究部门预测,“十二五”期间上海老龄化程度将处于加速增长阶段,2020 年上海市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 400 万,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30%。^[6]与此同时,到 2015 年 80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将超过 70 万。上海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约占户籍老年人口的 6.7%。然而上海养老床位仅占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 2.9%。

同时出现的新问题是,第一代独生子女^[7]的父母在此期间将进入老年期,也就是在新增的老年人口中 80%将是独生子女父母。老年人可获得照料支持的亲属网络将大幅缩小。这也将成为养老的一个新困境。

如前节所述,在分居的情况下,老人和子女交往的频率降低,直接的沟通渠道受到限制。从普遍情况看,对于子女来说,对孙辈的重视程度远超过对父辈的照料程度。按照中国孝文化传统,一个家庭对老人的照料应该远超过对于孩子的照顾。与人口数据一升(老人)一降(青少年)趋势比较,家庭照料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反向的一降一升现象,即重小轻老现象。这可能是受生物进化论思想影响,也可能是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思想在家庭中的畸形蔓延。认为老年人过时了,不需要有多少投入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孩子的身上。社会中,早教市场欣欣向荣,而举办各级养老机构却积极性不高。同样在家庭中,中青年夫妻对子女的投入不计成本,对老人的投入却斤斤计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

“养儿防老”的观念和客观条件都已经改变,老年人到底靠谁养老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养老福利已经瓦解,国家养老保障体系未完全建立和健全,老年人居住的社区逐渐由熟人社区向陌生人社区转变,传统邻里同事间在社区中的关系不复存在。“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受到挑战。

3. 养老保障制度构建

我国的养老支持体系包括正式的养老支持体系和非正式的养老支持体系。正式的养老支持体系主要是指国家对老人的照顾义务和照顾方式的集合,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的制度安排以及社区对特殊老年人的生活照顾体系,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支持体系。非正式的养老支持体系主要是从家庭、社区、市场所获得的照顾方式的集合,这是一种非强制的、自愿的支持系统。

随着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和发展,截至 2000 年,中国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在 35%,大多数人不能享受社会养老保障,大部分人只能依靠家庭养老。到 2012 年,全国有 2 147 个县(市、区)实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 343 个县(市、区)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8]加上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我国目前做到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但是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与全国老龄办调研(2012 年)显示,截至 2010 年,中国老年人在经济上能够依靠退休金养老的人数仅仅在 24%,仍然有 40.7%的老年人需要依靠家庭或者其他亲属供养才能维持生活。在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老年人能够依靠退休金养老。近 20 年来,城市老年人的在业率一直下降,目前维持在 5%左右的水平。空巢老人占整体老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构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我国开始重视建立养老服务体系。2013 年 9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将养老服务业提升为国家战略。截至 2012 年年底,我国建成的各

类养老服务机构床位达到 416.5 万张,平均每千位老人 22 张床位。

从照顾的方式来看,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9073”目标或者“9064”目标等。到 2011 年年底,上海市基本形成了“9073”的养老服务格局(即 90%老人属于家庭自我照顾,7%老人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老人享受机构养老服务)。从统计数据看,满足“9073”格局的硬件条件已经具备,但是调查发现,实际养老格局还是存在矛盾,比如,养老机构呈现出市中心紧张、郊区空置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推出一系列养老制度改革举措,比如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制度、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等改革要素。同时各地探索多种养老模式创新,如以房养老试点、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等等。从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养老政策分析,国家在努力推进社会化养老模式,诚然,这种社会化、制度化养老模式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进步。但是制度化养老毕竟能力有限,近年来制度性的经济支持和社区养老服务支持的力度加大,但是确实能够满足广泛的养老需求吗?这种制度化养老将对家庭养老功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养老责任究竟如何在国家、社会和家庭之间分配呢?这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 研究目的

目前中国的家庭养老特点之一是以年轻老人赡养年长老人为主。由于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刚刚退休的老年人大多数是健康的老年人,生活完全能够自理的老人,我们可以称其为乐龄人群。他们还可能承担着照顾自己长辈的责任,也可能承担着照料第三代的责任。现在对于延迟退休年龄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赞成的一方认为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可以缓解养老基金不足的矛盾,反对的一方则认为延迟退休年